

陈汉初 著

历史叙述

广东经济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汉初，年逾不惑。生于古邑揭阳之古溪湖心。其地山川灵秀，有众多唐、晋以至春秋战国之陶、瓷等文物出土。届而立之年，已从事新闻活动近十载，于中原报界渐露头角，国家报刊授予“优秀通讯员”之誉。尔后，移居鲎岛，乐坐啃史书之冷板凳，有潮汕地方史著述刊诸海内外报刊者达百万字。《星暹日报》先后连载其《孙中山潮汕之行》、《揭阳文化古今谈》等文札。90年代初，陈氏先后出版了《潮史拾零》、《东征风雷荡潮汕》、《潮人移台史》等论著。揭邑撤县建市后，陈氏返梓供职，仍从文事，任揭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目 录

· 潮 史 钩 沉 ·

揭阳文化古今谈	(3)
汕头与日本的早期通商贸易	(8)
潮汕办大学史话	(19)
1917 年成立的潮安农会	(22)
汕头一中的创办及其早期反帝爱国斗争	(24)
三十年代前后的枫溪陶瓷业	(31)
为爱国主义思想唱赞歌	
——介绍汕头《公言日报》的《神州义愤》栏目	(33)
华侨、港澳台同胞赈济潮汕“八·二风灾”灾民	(39)
浅谈《张氏手记》	(44)

两度东征在潮汕	(56)
青年的良师益友 革命的引路人	
——介绍《岭东民国日报》的《革命》副刊	(110)
“广东全省轮渡船务总工会岭东分会”会员证章	(117)
《我们现在为什么斗争》一书的发现及理论价值	(119)
“震东社会科学院”	(121)
潮梅海陆丰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3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单行本	(142)
创办初期的河婆中学	(151)
抗日战争期间的汕头市聿怀中学	(154)
写在“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之后	(157)
征集史料 功德无量	(159)

• 史实考订 •

岭东学联成立时间考辨	(163)
周恩来在广东金山中学几件史实辨正	(165)
周恩来在潮汕几件史实探讨	(167)
“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旧址质疑	(182)
“潮汕七日红”小考	(188)

• 人物春秋 •

孙中山潮汕之行	(195)
---------------	-------

民族气节垂青史 爱国精神励后人

——谢翱生平事迹简介	(201)
许美勋与潮汕早期新文学运动	(205)
追忆许美勋	(211)
叶纫芳其人及汕头社会主义青年团	(213)
张民达韩江遇难记	(219)
试论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主政东江	(222)
周恩来与《岭东民国日报》	(243)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党的群众路线所进行的理论实践探索	(248)
最早辑入周恩来文稿的文集	(261)
春涛精神 熠熠生辉	(263)
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中的历史功勋	(270)
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及其外交官郭沫若	(280)
张似旭的报业生涯	(283)
饶宗颐与百期《方志周刊》	(290)
躯体不寒 笔耕不辍 ——忆孙寒冰	(296)
后记	(298)

潮 史 钩 沉



揭阳文化古今谈

潮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诸多学者、专家已发表了不少独到见解。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上,揭阳市长、中心副理事长陈喜臣提出了潮汕文化的发展是“从榕江文化,发展到韩江文化,然后再到海滨文化”的观点。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文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人总是在江河流域生存与发展。古揭阳的主要江河——榕江、韩江与练江流域,特别是榕江、韩江流域,这一大片远古已形成的沃土,无疑是古揭阳较为繁盛之地。

古揭阳文化当然有史前史后之分,有土著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之分,有土著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结合后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之分。但本文讲的,主要是古揭阳建制形成后,土著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外来文化结合后形成的有区域特色的古揭阳文化。以榕江、韩江流域(包括滨海一带)为标志的古揭阳文化,究竟是两道“文明流”同步发展,还是非同步发展,这都是可以研究的。但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古揭阳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榕江流域应是古揭阳文明象征。这一点,我与诸位揭人多次切磋过,他们都认为陈喜臣的观点不无道理。

陈喜臣的这个构思,代表他对潮汕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源流的基本看法,阐明了潮汕文化的“积聚带”最早在榕江流域,后在韩江

流域，到处在榕江、韩江入海处的汕头海滨一带。

我认为，这个论点，可以从建制沿革、地方方言、出土文物、名人人文等方面来考察。

（一）从建制沿革上看，揭阳为潮汕建制之先

揭阳，春秋时期隶属百越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秦将任嚣、赵佗平定南越，遂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在今潮汕全境、梅县、大埔及福建龙溪、漳浦一带设立戍守区，始称揭阳岭。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发兵平南越，复置南海郡，辖揭阳、龙川、番禺、博罗、中宿、四会等六县，首任揭阳县令史定。

榕江，古称揭阳江，揭阳江无疑当以古揭阳县而得名。古揭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榕江流域，是符合情理的。

从那以后，古揭阳辖地、区划几经变迁，揭阳之名，只保留了一个县名。古揭阳辖地的中心由榕江流域转移到韩江穿流而过的潮州，建城时，为存古，其南门仍以揭阳命名，曰“揭阳门”。从那以后，人们也习惯将其辖区内的居民称为潮州人。随着汕头的开埠，其中心再转移到濒临南海的汕头。此后，人们才将潮州、汕头这两个地名连起来，产生潮汕这个名称、概念，古揭阳大地域的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

（二）从地方方言上看，揭阳话（称榕江话更为恰切）是今潮汕各县潮语中，保留古音最多的

瑞典著名汉学家认为，“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最古远、最特殊的”。饶平学者郑肫仁在《古县富古音》一文中称，揭阳是岭东最先建起的古县，尔后又建海阳、潮阳合称“三阳”。“揭阳先走了几大步，文化远比二县发达。由于这样，揭阳保存的古 êng 韵母音特别多，特别牢固，自来人们称羨榕江人语音特别优美悦耳，这是多

古ēng韵母的缘故”。“揭阳话是潮州话最古的语言”。揭阳人的言谈间,常常带有“儒”、“乃”等。现今揭阳人常说的“儒”,有“美”、“好”、“圆满”等意思,这充分说明揭阳人对儒家的崇拜。而“乃”在古诗文中表示前后语气、词句的连接。唐杜甫五言古诗《赠卫八处士》:“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一个“乃”字,使主人忙于招待诗人的情景跃然纸上。五言律诗《月夜忆舍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用一个“乃”字,把“忆舍弟”迫切心情的缘由一笔抽了出来。因此,“乃”字在古汉语中,虽无实义,但作用不能小看。这也是今揭阳话中仍保留着这个“乃”字的原因。

因揭阳语保留的古音多,故外县人听之却觉稀奇,甚至当作笑柄戏之。殊不知,榕江人牢固地保留着的古音,很有研究价值。

语言是活着的化石,它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并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的口语言传之中。郑肫仁先生认为:“榕江辉煌文化最悠久,语言粘结力特强,人们换了音,榕江人仍牢记旧音,改不去”。揭阳语保留众多古音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揭阳是潮汕最古的县,喝榕江水,操揭阳语者,其地域可能就是古揭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 从出土文物上看,古揭阳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揭阳出土的文物有战国铜剑、铜鼎、铜锄;揭阳黄岐山、旧坑尾、龙船石等地区,发现了随葬铜镜的汉墓;新亨溢溪村、玉滘三虎山、埔田鼎盖山等汉代遗址,出土大量汉代陶器,溢溪村还出土过汉代钱币;桂竹园汉墓出土了四个陶环,瓮内水库岭后岙、山边园遗址,先后出土了手斧状石器、骨斧、磨光穿孔石犁头等一批远古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1940年揭阳河婆南森乡建校出土的一批青铜剑、刀、矛、玉、璧和陶器,其中两柄刀上铸有“秦”字铭

文。这批文物，令人注目。据称，这些宝贵文物被揭阳真理医院美籍卜瑞德购去。1960年秋至1980年，又在那里出土青铜剑一把、矛一支、钺二件和一些陶器。河婆霖田祖庙（又称三山国王古庙），据说建于1400年前。该庙不管从庙宇建筑还是从传说的寓意方面，都说明庙宇所在地，是古揭阳人口聚居地之一，人文文化也较为发达。

从现已出土的榕江流域文物看，榕江流域是古揭阳较为繁荣之地，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但纵观整个潮汕出土文物、榕江流域出土文物的年代和规模并未排行第一，但这与本论题并无矛盾。因为，古揭阳建制的形成，潮汕历史文化的形成，故然与潮汕土民不无联系，但与中原移民和中原文化的联系似乎更为直接、更为紧密些。

（四）从名人、人文上看，揭阳也是斯文之地

古往今来，揭阳有“海滨邹鲁”的美称。人才比比，魁杰济济。汉时之吴弼，晋时程旻，皆系有才有德之士。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职位由龙川令赵佗担任，赵佗及其子孙也在南越长达93载的统治中，对岭南文化的开发和促进委实起了不可磨灭、难以低估的作用。据古书载：“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赵佗率军“攻取陆梁地”时的威武不屈之形象，也可以觉察他“长治南方，甚有文理”之超群才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潮汕历代名贤，确有不少揭阳人。民间传说当时御街说白话，这里的御街，指的是京城，这里的“白话”，指的是揭阳话。

特别是嘉靖至康熙年间，揭阳出了文武曲星，俗称文武香球（文状元）林大钦和（武状元）林德镛。这一对文武香球，其文功武治之绩，不但在当时震动九州，而且在今天仍然饮誉四海，有口皆

碑。

综上所述,古揭阳文化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揭阳文化的研究应是潮汕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所以,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古揭阳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进而举办“古揭阳文化展览”,成立“古揭阳文化研究会”等。这对于恢复揭阳应有的历史地位,弘扬古揭阳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新设立的揭阳市的知名度,进一步团结全市人民,同心同德,振兴经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二次理事会上的发言,原载1993年2月28日《星岛日报》;《中国新闻》第145期,1993年5月9日)

汕头与日本的早期通商贸易

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汕头,由于它特殊的地理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产,早为日本工商界所瞩目,与日本有着较长的经济往来。

汕头是一个著名的沿海港口城市,它地处潮汕平原三道主要江河的汇合出海处,韩江、榕江、练江犹如三条银带,使汕头与“潮梅各属及闽赣边县”的大片土地紧密相连,“其商业经济影响所及范围甚大”。计有:潮属的潮安、潮阳、揭阳、澄海、普宁、饶平、大埔、惠来、丰顺、南澳等10县,嘉属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等五县,汀属的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连城、归化、永定等八县,赣州及宁都的雩都、兴国、会昌、长宁、宁都、瑞金、石城等七县,“面积约二十万方里有奇”^①。汕头东、西、南三面濒海,东距台湾200余海里,西南距香港近200海里,并与南洋群岛相望,且拥有长达3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容纳众多船只之良港。勤劳勇敢的汕头人民早就有“远涉重洋,从事运输”的习惯。特别是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潮州(后改在汕头)被迫增辟为通商口岸,经由汕头的外出经商者逐日增加,来汕外籍商人也纷沓而至。据史料

^① 肖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1925年5月。

记载,汕头先后与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挪威、荷兰、俄国、爪哇(荷兰殖民地)、苏门答拉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有直接经济关系,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挪威、美国、俄国(法国领事代)依次在汕头开设领事馆,驻汕外籍侨民多达200户左右。^①汕头遂成为粤东重要交通枢纽、进出口岸和商品集散地,步入中国屈指可数之重要港口之列,对外贸易额居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青岛、广州之后,排行第七。^② 到其“黄金时期”,汕头港口的年吞吐量高达675万吨,仅次于上海港和广州港,而居全国第三位。潮汕地方史志对早期的汕头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陇、沙汕头(现汕头市这一地方)、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犬牙错处,风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屯积,为海隅一大都会。”^③ 这记述的是汕头港形成初期的繁忙景象,其鼎盛期的繁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二

潮州与古琉球(今日本冲绳)的交通,早自隋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就已开通。当时的路线是:先由义安(今潮汕)出发,经八重山,次经宫古岛,仍至琉球之那坝。到了琉球岛,欲涉日本本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因为汕日通商有诸多方便之处,所以汕头商人到日本较到西洋国家为先;日本商人到汕头,也“较欧人东来为早”。大量史料证明,汕日通商在汕头对外贸易史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纵观汕日经济关系的经纬梗概,大致经历了由主动到被动、由顺差到逆

① 谢雪影:《汕头指南》,1947年5月1日再版。

② 恽代英:《旅行潮汕的感想》,见1926年3月30日《人民周刊》第7期。

③ 李之吉重修:《澄海县志》,清嘉庆十九年。

差、由繁盛到衰退的过程。

业瓷长崎,揭开汕头对日本通商贸易的序幕。汕头与日本的贸易,始于何时,已无确切史料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汕日通商在汽船贸易以前就已开始,并伴随着清乾隆中期以前对外贸易政策趋于开放的形势而开始发展起来。但那时由于交通工具非常落后,输入、输出的货物都用帆船运载。这些帆船利用自然风源作动力,在无风或逆风时,就得摇橹前进,困难重重,即使一帆风顺也得上月甚至数月才能抵达;有时遇上恶劣天气,在航行很长时间后还被风浪打了回来,或葬身于大海。尽管风险大困难多,“迫于生活需要,本着冒险精神”^①,早在很久远的时候,潮梅人士就用帆船由汕头运载陶瓷到台湾,经琉球群岛至日本长崎^②。

在汕日经济交往的初期,靠着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帆船,汕头在对日贸易中长期占了上风。就是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汕头的大门为帝国主义国家敞开,客观条件仍对日本十分有利,但由于日本“尚无直接之船载货”到汕,“所恃为交通之媒介”(只租用德国帆船2艘、英国帆船3艘),故在汕头正式开埠之初(清同治二年),日本向汕头输出额只有1000余两(关平银,下同);而汕头输出日本之额则相当于日本输入的13倍,达14000余两。

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改进,日本使用了汽船,汕日通商贸易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光绪七年(1881年),日本开始有两艘汽船行驶来汕,年输入货物1080吨,值21074两。自那以后,贸易额日益增加。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汽船已增至16艘,输入货物6593吨,值104622两。货物中为数较多的是珍贵药材人参和棉布。而汕头向日本输出则渐次减少,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由汕向日输出只有100两。

^① ^②肖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1925年5月。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随着中国在军事上的溃败,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膝投降。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等地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以台湾为基地,大量屯积商品,“待价而沽”^①,并经高雄、基隆海关运入汕头。尤其是在1899年大坂商船株式会社在台湾设立淡水——汕头——香港汽船航线后,日本开始有定期商船经过汕头,这便使日本对汕贸易如虎添翼。是年,日本驶往汕头的汽船达99艘次,运载货物86256吨,值264976两(含台湾货物),光从日本本土输入之额就值235389两;汕头向日本输出值157190两。这一年,汕日贸易额高达422166两。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帝国主义为了勒索巨额赔款,于次年逼迫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将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赔款来源抵押给列强,汕头海关和常关遂落入外国人之手。日本也乘此机会在汕头再辟基隆——香港线和高雄——广州线(属大坂商船株式会社)、上海——广州线(属日清汽船公司)和基隆——海防线(属山下汽船公司)。这几条航线的汽船往返都经过汕头。由此,日本对汕贸易进入了繁盛时期,来汕船只最高年达200余艘次。

日商驻汕,占据了汕头埠的商品、金融优势。日本人在汕头设立商店,标志着汕日贸易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汕头开设的第一家日本商店,是蛭田万次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高华路十二号办的“大成洋行”。这家洋行经营杂货商店一间、照相馆一所、卖药店一处,开了外国人在汕头设店经商的先例。接着,步蛭田万次郎来汕的经商者数以百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驻汕

^① 肖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1925年5月。

日侨已达 300 余人。这些侨民还在联和里十八号设立了“日本人协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内河力在联和里西巷 31 号开办“台湾银行”,内有职员 15 人(日本人 5 名,中国人 10 名)。这就使日本实现了“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① 1912 年,“三井洋行”又在汕头设立支店,专门掌握汕头的商业行情,为日本资方提供生产、消费信息。此外,还开设了众多的旅馆、医院和学校,如“南进旅馆”、“华安旅社”、“敷岛旅馆”、“汕头旅馆”、“中山医院”、“宏济医院”、“东瀛学校”等。到 1918 年末,驻汕日侨已达 370 人。

日本商人承包潮汕铁路建设工程,这是汕日经济关系史上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件。光绪三十年(1904 年),我国第一条由华侨集资兴建的商办铁路——潮汕铁路着手筹筑。在完成这一破天荒的好事中,由于日本人的插手而泛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波。

在集资过程中,世代在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经商的林丽生(原籍福建安溪)加入股份。日本报界就造舆论说:潮汕铁路有日本股份,属日本势力范围。这引起我国留日学生的不满和汕头当地人民的反对。大股东张煜南先生出自爱国之心,当面与林丽生协商,加息款 30 万退还林的股份,才使日本舆论界无懈可击。

路权风波后,日本商界仍死死盯住潮汕铁路,日本三五公司爱久泽直哉终于利用关系,与铁路股东订立了承办全路铺设工程的合同。在开工修筑过程中,因在拆让庐舍、迁徙坟墓等问题上没处理好,加上日本铁路工人往返践踏于村落间,引起了铁路沿线农民的怀疑与反对。1904 年 12 月 16 日,葫芦市乡民与日本工程司发生了冲突,数百乡民立旗执械,围攻日本工棚,结果殴死日本工人 2 名,打伤 4 名(1 名工人、3 名护勇)。日本当局为了获得领事裁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91、592 页。